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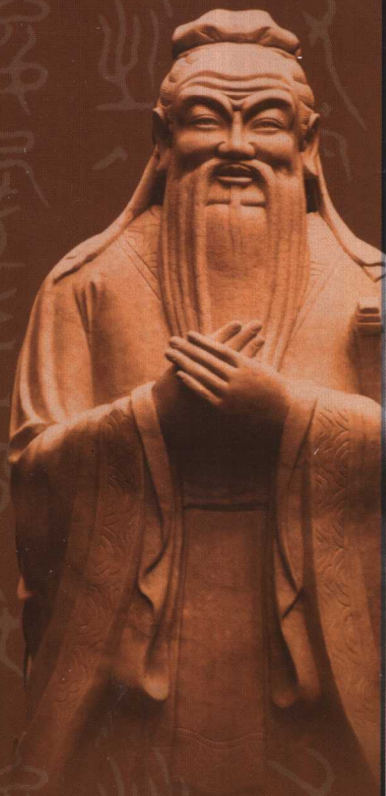
圣境

——
儒学与中国文化

张立文主编

彭永捷副主编

传统与人文



人
民
出
版
社

圣 境

—— 儒学与中国文化

张立文主编 彭永捷副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田 园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境——儒学与中国文化/张立文主编 彭永捷副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传统与人文丛书)

ISBN 7-01-005008-2

I. 圣… II. 张… III. 儒学-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147 号

圣 境

SHENG JING

——儒学与中国文化

张立文 主编 彭永捷 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2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5008-2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远播海外,影响深远,渐成为世界性的学问。儒学不仅在先秦时便成为“显学”之一,而且两汉后被奉为官方哲学,直至清代,一直居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儒学称谓始于汉,汉代实现了由儒家向儒学的转变。儒学,简言之,为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其主旨是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儒学由于官方的提倡,不仅成为一切学术思想的源头和根据,而且成为国家公共生活和个人家庭生活所必须依照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国家的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人才培养、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宗族组织、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思维方法、心理结构、生活方式,都受儒学的支配和影响,反过来又促成了儒学的发展。儒学就在与现实社会的百姓日用之学的互动中,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不断变换自己的理论形态;如两汉经学儒学,魏晋玄学儒学,隋唐注疏儒学,宋元明清理学儒学,近代新学儒学等形态,使儒学显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西学的激烈冲击。首当其冲的无疑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因此“打倒孔家店”,“扫除孔老二”的呼声时有所闻,这种情境固有其时代的内因与

外缘,但亦需要做时代的反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而且是儒学的大毁灭,其粗野破坏性,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不可弥补的大损失。

儒学说到底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关系的规范。儒学以“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思想协调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化解人与社会的冲突;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孔颜之乐”调理心灵冲突,以凸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这就是儒学人文精神的宗旨。

儒学与其他学说一样,在中国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负面作用,需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由于人为的某种需要,忽而夸大其积极的作用,而把儒学愈抬愈高,以至神圣不可侵犯,若有所不敬,便是“叛经离道”,“异端邪说”;忽而又膨胀其消极作用,把儒学打入十八层地狱,批倒批臭,使之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利用儒学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做法必须根绝,不能再发生,免使中华民族文化再遭劫难。

儒学就是儒学,它只是一种学说,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不是政治运动的对象,也不是权力运作的对象,这是本书编辑的指导思想。因此,本书力求对儒学做出历史的、合理的、公允的评价,而尽量避免情感的、偏激的、主观的因素,并尽力贴近儒学的本来面貌,给读者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儒学形象。

本书由方国根编审策划,在各方同仁的帮助,以及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现将本书各章撰写情况说明于下:

第一章,张立文;第二章,宋志明;第三章,彭永捷;第四章,刘宝村;第五章,孟晓路;第六章,陈劲松;第七章,张云飞;第八章,张法;第九章,鄢爱红;第十章,向世陵;第十一章,罗本琦、方国根;第十二章,宋文敬。

借本书付梓之际,对一切帮助、支持本书出版的友好,表示衷心感谢。

2000年8月20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儒学义蕴的诠释	(1)
二、价值理想的追求	(19)
三、儒学的人文精神	(31)
第二章 儒学与哲学	(59)
一、中国哲学的根基	(59)
二、经学与哲学	(66)
三、理学与哲学	(68)
四、实学与哲学	(75)
第三章 儒学与伦理道德	(80)
一、儒家伦理	(81)
二、儒家道德	(89)
三、伦理教育与道德修养	(93)
第四章 儒学与法学	(97)
一、儒法的历史渊源	(97)
二、先秦时期儒法的争鸣	(101)
三、秦汉后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109)
四、近代化过程中的儒学与法学	(123)
第五章 儒学与宗教	(127)

一、何谓宗教	(128)
二、儒学与宗教	(130)
三、儒学与生死	(134)
四、儒学与佛学	(137)
第六章 儒学与社会学	(144)
一、儒学精神的社会学解析	(145)
二、儒学社会与精神的合理性成长	(157)
三、儒学社会的伦理控制	(169)
第七章 儒学与科学技术	(190)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精神	(190)
二、正名解蔽的科学方法	(201)
三、谨其时禁的大生态观	(216)
第八章 儒学与文学艺术	(227)
一、儒学与建筑	(228)
二、儒家与书法	(231)
三、儒学与绘画	(234)
四、儒家与文学	(240)
第九章 儒学与经济	(249)
一、儒家经济思想	(249)
二、儒家经济思想的伦理特色	(259)
第十章 儒学与管理	(273)
一、何谓管理	(274)
二、人性与激励	(276)
三、组织与分工	(282)
四、目标与决策	(286)
五、权变与动力	(293)
六、领导与人治	(297)
第十一章 儒学与东亚	(302)

一、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	(302)
二、中、朝(韩)、日儒学比较研究及其理论特色	(324)
三、儒学与东亚现代化	(348)
第十二章 儒学与西方	(367)
一、儒学在西方的传播	(368)
二、西方人对儒学认识的变化	(380)
三、儒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地位	(411)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先秦便成为“显学”,一直居思想领域的主流地位,并远播海外,影响深远。它于公元前 140 年左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超越国界,而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

一、儒学义蕴的诠释

什么是儒学?儒学是什么?儒学为什么?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然加以深究,又似乎是语焉不清的。其实,儒、儒家、儒学、儒教的内涵是有差分的,不可混淆。“儒”,许慎《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①唐孔颖达《礼记·儒行》疏引郑玄《目录》:“儒之言优也、柔也。”^②后人据此而释为柔弱、柔缓。胡适在《说儒》中以“儒”字源于“需”,“需”与“奘”通,《广雅·释诂》:“奘,弱也。”“柔”这里并非指懦弱、犹豫寡断。柔是中国母系

① 徐灏:《说文解字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

② 郑玄《礼记·儒行》注:“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按:在这里,柔也有和的意蕴。

社会阴性文化的遗传。《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七十八章）以水象征柔弱，意蕴柔与水一样具有很大的渗透性、宽容性或包容性，而不像坚强的石子那样具有不可入性、排他性。“柔之胜刚”，犹如洪水猛兽，最刚强的事物也能被水这样柔弱的东西所摧毁。“儒，柔也”，柔是一种品质和境界，并非任他人欺辱的懦弱性，而“应视之为高尚、优雅、和谐、成就等完美人格的形容”^①。

儒作为术士的称谓，是指古代从巫、史、祝、卜等方士中分化出来，熟知诗书礼乐，从事相礼事业的人。礼起始于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时期是礼制形成期，夏商周三代是礼和礼制的发展成熟期，从夏代二里头文化的觚、爵、盃，安阳殷墟商代王宫、王陵、人殉、车马坑等形制规格，以及西周墓葬出土的成批礼器来考察，礼和礼制已十分严密。从《周礼》和《仪礼》等文本来看，几乎国家政治生活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事务都纳入礼的范围。那么，这样纷繁庞杂的礼由谁来指导实行？由谁来承传？从商代甲骨卜辞中证明，有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礼仪、宗教活动的人，他们就是礼和礼制的指导执行者和承传者，他们又是当时的有知识和文化的阶层。“儒”作为相礼的有知识文化的术士，就是这一阶层中的成员。孔子对礼和礼制就有所研究，“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并为人相礼的实践：“乡人雉，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雉”是古代迎神驱鬼疫的仪式，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边台阶上。这种实践，对于他创立儒家学派有着基础性作用。

儒是以六艺教化百姓的学者。《周礼·天官·大宰》：“儒以道得民。”如何以“道得民”？只有以六艺之道教化百姓，才能“得

①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1页。

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保氏^①是诸侯所设立的掌管教化的官。《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以“道艺”和“六艺”教民的与司徒有关。帝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②又“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③。“五教”韦昭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舜任命契为司徒，要他协调、化解百姓不相亲睦、父子兄弟之间的社会名位等级秩序不顺的种种冲突，通过教化和自觉，达到和合五教。后演变为以“六艺”、“道艺”教民的儒。

近代以来，对儒的理解和诠释歧异：章炳麟认为儒有“达、类、私”三层涵义：达名的儒是指“知天文占候，谓之多技”的“术士”；类名的儒是指“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者；私名的儒是指刘歆《七略》所说的儒家的儒^④。胡适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殷族的教士”，郭沫若在《驳〈说儒〉》中认为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等等。

儒是孔子儒家学派创立之前就已存在的，具有文化知识，以“六艺”与“道艺”得民，以社会伦理教民，从事相礼实践的人。

儒家为春秋末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指信奉孔子学说，并归宗于孔子的学派。这一派与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成为“显学”。称儒为家，始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

①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地官·保氏》，《周礼注疏》卷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1页）。

② 《舜典》，《书经集传》卷一。

③ 《郑语》，《国语》卷十六。按“契”是商族始祖帝喾的儿子，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他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任为司徒，封于商。事迹见《殷本纪》，《史记》卷三。

④ 《诸子学·原儒》，《国故论衡》。

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①。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孙卿）学派最重要。后世凡信奉孔子学说，归宗于孔子者，都可属儒家。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②。儒学，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儒学的主旨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现对此界说稍做解释：

第一，儒家学派虽由孔子开创，但儒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并在国家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儒家把自己的发生，说成源远流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绍弘尧、舜，效法文武，所以后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作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道教的道统相对应。如果儒学道统起始于尧，则尧是道家黄老道统的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③，这便有儒道同源和儒比道后之弊，于是后人将有将儒学道统上溯到伏羲。相传伏羲为人类的始祖，“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④。包牺氏即伏羲，亦作“宓戏”、“伏戏”等。他“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⑤，教民渔猎农耕。他作八卦，后周文王囚于羑里，据以演为六十四卦。伏羲被归属于周文的谱系。按《周易·系辞下传》的记载：包牺氏没，神

① 见《显学》，《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1—492页。

② 《五宗世家》，《史记》卷五十九。

③ 参见《五帝本纪》，《史记》卷一。

④ 《系辞下传》，《周易本义》卷三。

⑤ 同上。

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伏羲便先于道学谱系的黄帝。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是与孔子的极力尊崇分不开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赞扬尧的伟大像天那样高大，他给人民以恩惠，使仪礼制度完善，他的功劳不知道用什么美好的语辞才能表达。孔子称扬舜和禹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虞舜和夏禹富有四海而为天子，却不贪图个人的享受。“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自己住得很坏，而把财力用于治理农田水利。商汤伐罪“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嗜酒好色的夏桀，代夏建商，“功参天地，泽被生民”（《荀子·臣道》）。孔子对周文王、武王不仅推崇其道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而且自认为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并以文武之治为他的政治理想。后人鉴于此，把他们都纳入儒学发生、发展的系统，即“道统”。

周公对孔子仁、礼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他“制礼作乐”，损益殷礼，完善了典章制度，后称为“周礼”。他鉴于商亡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主张，“以德配天”，才能保有周治四方的天命，并主张“明德慎罚”，对百姓实行“德治”，才能保民配天。孔子记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周公教诲他儿子伯禽，不要简慢亲族，不对人求全责备。周公“敬德”、“不施其亲”等，被孔子发挥解释为仁爱的思想。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说文》：“随行也。”有承继周的意蕴，他在年老体衰时，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于是形成由孔子集大成的周孔之学。

自孔子建构儒学理论以后,儒分为八,八派对儒学均有发展,均应有著述问世。除《孟子》、《荀子》传世外,《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世子》二十一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等,皆已佚。可喜的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十二篇(或十四篇)^①,其中有《鲁穆公》(原题《鲁穆公问子思》)^②,可能属于思派的著作。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购回的一千二百多支战国竹简^③,其中可能有上述佚失的儒家著作的一部分。儒学八派由于对孔子学说理解诠释的差分,相互之间亦有论争和批判。如孟、荀的性善性恶之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以及《荀子·非十二子》批判思孟“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并指摘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为“贱儒”。战国时孟子、荀子两派最显,“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④。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很大打击,“孟子徒党尽矣”。汉唐儒学由董仲舒吸收阴阳、名、法各家思想,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生;魏晋时儒学由两汉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向重义理的玄学转化,玄学以道家有无之辩为主旨,会通儒道,融合名教与自然。隋唐时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韩愈扬儒排佛,柳宗元主“统合儒释”,儒学开始由汉学向义理之学转变。宋元明儒学在隋唐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情境下,而落实到理学上,理学在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中,和合为新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理论思维的最高形态,现代新儒学各派是接着宋明新儒学讲的。

① 参见《略论郭店楚简的“仁义”思想》,《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参见《郭店楚墓竹简篇题的认定》,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

③ 《郭店楚墓竹简》简最长者为32.5厘米,最短者为15.1厘米。上海博物馆战国简最长为57.1厘米,最短为24.6厘米,可推知这批竹简非郭店失盗的竹简,有可能郭店楚简未被盗。

④ 《儒林列传》,《史记》卷一二一。



第二,儒学的宗旨,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所当然的探索。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孔子为挽社会秩序的失调,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迷失,以开放的、担当的精神,求访贤人,坦诚学习,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搜集、整理古代文本,然后删《诗》、《书》,正《礼》、《乐》,系《周易》,作《春秋》,而成为“文不在兹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其孜孜以求的宗旨就是为了使社会有秩,伦理有范,精神有乐,化解社会、伦理、精神三方面的冲突,而其化解的理论形式注重于规范型和伦理型,即“应当”、“应然”的层面,对于超验层面的自然、社会、人生背后的所以然的探究的力度较弱。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①对现实经验层面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所当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不可变易的价值。但由于“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②为千万数的经传所累,所蔽,就无多余精力来思虑、追究现实经验背后的所以然。

儒学并非完全不注意所以然的探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他对求道的重视。班固在《诸子略》中概括说,儒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论语》“道”字60见。从道的初义道路之道到道德、学术、方法之道,都有论述。道路之道,是可见、可摸、可感知的外在客体之道;道德、学术、方法之道有两个层面: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是可感知的;未发的道德意识,未发表的学术思想,未实行的方法,是非经验的。如何追究已发、已见、已行背后的根源而获得道,这就是“于道最为高”的道。“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

① 《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〇。

② 同上。

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寝衰,此辟儒之患。”^①儒学浸衰的原因:一是违离道本,二是乖析《五经》。

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家,他们在外来佛教哲学和本土道教哲学的挑战下,建构了以理和心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理学家所构筑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进路、追求目标大相径庭。中国形而上学进路是经验体认型,西方是概念分析型。按程颐、朱熹一脉对《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这句话是对形而上“是什么”和形而下“是什么”的诠释。“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②“是什么”是对形而上与形而下内涵的规定和表述,这种“是什么”内涵的规定与“为什么是”哲学形而上学的追根究柢是混而为一的。“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③洒扫之事与之理、形而下与形而上关系,是“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假如沿着“然”与“所以然”的思路,来分别形而上与形而下,可能发展出本体论的逻辑分析。但形而上与形而下、“然”与“所以然”、道与器之间,程颢直以两者是不分的,“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面对这种情境,朱熹在《周易·系辞传》与程颢之间,便面临两难选择。“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既要‘界止分明’,又要不相分离,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自相冲突之中,但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不杂不离的辩证思维,

① 《艺文志·诸子略》,《汉书》卷三十。

② 《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7页。

③ 《论语或问》卷十九,《朱子遗书》。